

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是中国外交的主线，更是灵魂。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讲到，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采访谈到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时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公共卫生外交体现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政府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具体体现。随着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频发，公共卫生议题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项显性议程，并逐渐进入外交政策领域。早在1996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我们正处于一场传染性疾病的全球危机的边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免受其害，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对此高枕无忧。2008年11月26日，第63届联大通过第33号决议《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第一次使用了“全球卫生外交”这个概念。该决议着重指出全球卫生也是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的长期目标，需要不断地注意和做出承诺，并加强国际合作，而不是仅仅限于紧急情况。

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历程

公共卫生外交既指利用卫生工作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也指利用对外政策来实现卫生目标。在卫生发展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是中国公共卫生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实践有几个重要历史节点。

第一，援外医疗队是中国公共卫生外交事业的起点。196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政府应邀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第一支援外医疗队，揭开了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序幕。1963年4月6日，从北京、上海等优秀医生中抽调的24位医疗队员奔赴阿尔及利亚，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不畏艰苦、救死扶伤。截至2019年11月，从第一批的24人累计到26万人次，先后远赴亚、非、拉、欧和大洋洲的71个国家，累计诊治患者约2.8亿人次，其中



约2000人次获得受援国政府颁发的总统勋章等各种国家级荣誉，51名队员因公牺牲在异国他乡。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刚果（布）期间，提炼总结出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队精神。援外医疗队已经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外交与大国担当的名片。

第二，抗击非典促进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与加强国际合作。2003年非典疫情的蔓延，暴露了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不健全，卫生部门敏感性不强，应急救治能力不足等问题，也认识到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手段。取得抗击非典疫情胜利后，进一步密切同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国家的友好合作，相关领域补短板的工作加紧推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文件先后出台。2006年11月9日，香港卫生署前署长陈冯富珍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闭门会审议，成功当选为世卫组织总干事，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联合国机构中担任最高负责人职位。

第三，援非抗埃是我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埃博拉病毒最初于1976年在非洲首次被发现，并曾引起过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暴发，但均呈现地域局限、规模小、时间短等特点。2014年3月，在几内亚发现并确认了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并传播蔓延至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非洲邻国，美国、西班牙、英国等欧美国家也相继出现病例，呈现全球蔓延态势。2014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9月19日，联合国历史上首次

启动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中国政府及时向西非疫情国家伸出援手，成建制地派出临床和公共卫生专家1200多人次援非，在我国公共卫生援外史上是派出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工作覆盖最广的一次。

第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公共卫生外交进入全球健康治理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使各国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主权国家国内的问题，或者是其外交政策的问题，而且是典型的全球健康治理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强大、富有或者技术先进，都无法单独发现和应对所有公共卫生威胁，因此需要高效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中国第一时间向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信息，与全球180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专家视频会议，向多个国家派遣医疗专家组。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强推动国际卫生合作的顶层设计能力，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产品。

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鲜明特征

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公共卫生外交虽然起步较晚，但具有鲜明的特征。

第一，中国公共卫生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也服务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185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在巴黎召开，讨论在建立防疫区方面的合作，揭开了现代意义上公共卫生外交

与国际合作的序幕。但那时，欧洲国家为解决自身遭遇的霍乱等疫情召开高频次的国际会议，对其他地区的流行性疾病如美洲的黄热病等没有关注的兴趣。有专家指出，尽管现代公共卫生经常被定性为一种人道主义行动，但是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却长期将其与国际贸易的需要联系起来。然而，对中国而言，在全球范围，只要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有中国援助的身影。例如，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医疗保障任务是典型的苦活、累活、脏活，自2002年向刚果（金）派遣首支维和医疗队以来，只要在战火与贫瘠的联合国任务区就可以看到中国维和医疗人员忙碌的身影。

第二，中国公共卫生外交强调统筹协调，注重创新，注重实效。2012年5月，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应端士日内瓦高等研究院邀请，在《全球卫生2012》特刊上发表《中国卫生外交》一文，强调中国的卫生发展合作包括派遣医疗队、建设医院、设立疟疾防治中心、培训卫生技术和管理人员、提供药品和医疗物资，也包括支持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联合国机构，以及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等全球卫生新倡议，为改善全球卫生状况作出了积极贡献。以2008年入列的“和平方舟”为例，这是我国首艘万吨级大型专业医院船，是我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创新实践。每到一国，“和平方舟”医院船除了利用主平台为当地民众诊疗，还派出多支医疗分队前往当地医院、学校、社区、军营、海岛等，为更多民众巡诊送药。截至2019年底，“和平方舟”9次走出国门，累

计航行24万余海里，到访43个国家和地区；为23万多次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实施手术1400余例，让500多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被称为和平之舟、生命之舟、友谊之舟。

第三，中国公共卫生外交强调国际合作，重视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首先，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发起国之一。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中只字未提卫生工作的内容，也没提及要建立一个国际卫生机构。中国代表团同巴西代表，提交的“建立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的宣言”，为创建世界卫生组织奠定了基础。世界卫生组织是负责卫生事务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完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帮助世界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安全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公开质疑世卫组织作用并提出暂停向该组织提供资金，中国则支持世卫组织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疫情的能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国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的领导作用，就是支持联合国，就是支持二战后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世界卫生秩序。

第四，中国公共卫生外交以先进理念为指导，符合国际法准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1964年2月18日，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期间提出了对外援助八原则，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严格遵守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和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所派出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

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西方国家往往在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以便通过援助影响和改变受援国的发展进程与政治方向，而中国始终坚持主权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始终坚持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地位平等，是朋友和伙伴的关系，不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不断深化与完善，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指导理念。共同体理念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强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强调结伴成行、相互借力，强调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第五，中国公共卫生外交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讲，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与历史，便了解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有什么样的文化底蕴便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外交风格。中华民族是尚道义的民族，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讲情重义、先义后利，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除文化理念外，中华民族有很多文化资源，如青蒿素等中医药。自2008年起，中国为非洲国家设立了30个疟疾防治中心，并提供价值1.9亿元的青蒿素类抗疟药品。从中药材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的疟疾治疗药物”。2018年，中国在塞拉利昂援建了首个热带传染病防控中心，以提升非洲国家自主公共卫生防控能力。2019年7月4日，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非洲抗疟下一步，中国走在最前列》的文章，指出中国在非洲的科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能向世界展现：中国带给非洲的远不只是道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中国专家帮助下，非洲岛国科摩罗疟疾发病率大幅下降，已实现病例“零死亡”。

公共卫生外交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未来会积极参与健康相关领域国际标准、规范等的研究和谈判，完善我国参与国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紧急援外工作机制，增强在国际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的话语权与塑造力。



从两个大局出发思考处理问题

□ 李 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统筹两个大局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重大原则和根本遵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交融交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大变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时代背景和外部环境。全局和变局相互作用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只有将民族复兴与世界大变局紧密结合，牢固树立国情意识和世界眼光，从两个大局出发思考处理问题，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把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统筹两个大局的重大意义

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科技进步催生万物互联时代到来。各国处在复杂内外关系交织互动的节点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再次证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是世界各国唯一正确的选择。“脱钩”和“关门”不可能也不理智。只有统筹两个大局，才能登高望远，观大势，把方向。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选择。统筹两个大局，有助于更好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宏大时代背景，有助于更深刻理解其科学体系、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有助于真正将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因应中国与世界关系深刻变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统筹两个大局，有助于更好

认识中国与世界全方位接触的新规律，促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相互点亮，共同发展。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需要。我国的历史交汇期和国际体系的转型过渡期相互叠加，地缘政治等传统安全和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外部环境中风险更加连锁联动，挑战更加多元多变，前进的道路上可能还会有惊涛骇浪。统筹两个大局，有助于我们把握关键节点，不惧风雨，不畏险阻，攻克克难，闯关夺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从两个大局出发思考处理问题，应注意的几个关键词

联动。国内和国际因素相互渗透、叠加、累积、放大。国内问题处理不好容易产生国际影响，国际问题也可能成为干扰我国发展大局的主要因素。任何将国内国际两方面分割、孤立、静止看待的高估，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既不能高估更不能低估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将中国作为关键变量、而非置身事外观察分析变局。

辩证。中国只有在大变局中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弯道超车，但与世界联动越多，风险越大、危机越大。中国创造了“木秀于林”的成就，也迎来了“树大招风”的时候。危和机同生并存，相互转化，大危机蕴含着大机遇。

底线。统筹两个大局，首先要明确立场、厘清边界、划出红线。对于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界限，绝不能触碰、践踏和逾越。

运筹。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善于战略谋划和通盘考虑。把握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着眼全局看局部；把握好谋势和谋子的关系，既赢得胜

利，更赢得主动；把握好战略和策略的关系，既总体布局，又微观着力，找到最佳政策设计和最优行动路径。

斗争。重点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结合点上，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必然性、长期性、复杂性。把握好时、度、效，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

从两个大局出发思考处理问题，应重点支持和把握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把握好两个大局的根本保证，是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是在大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定海神针。党的全面领导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必须体现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从统筹两个大局的角度，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是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关键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的崩溃、“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解读“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阐释中国道路背后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内核，诠释中国制度建设的重大国际意义和世界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的美好生活是党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为挽救生命，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同时，中国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积极开展对外援助，截至4月27日，中国政府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向16国派出医疗专家组，同156

个国家举行了119场视频专家会，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突如其来的疫情再次告诉我们，各国祸福相倚，安危与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面对不分国界和种族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显重要和紧迫。我们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加强与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推进公共卫生治理合作，成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

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开放，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疫情面前，我们推动各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挖掘国内市场，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的全球化布局 and 配置。用好国内国际两类规则，对国际规则从接轨、并轨向铺轨发展，积极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

当前，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从未如此丰富，利益的时空交错从未如此复杂，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使命和责任从未如此神圣重大。大疫当前，有西方政客借疫情搞“甩锅”，要中国赔偿，甚至提出国际调查、“秋后算账”，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于情不容，中国坚决反对。我们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企图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华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



（上接1版）继续做好“保供给、防滞销”活动，组织开展好“52决战收官”专题活动，开设“三区三州”攻坚专区，切实帮助贫困地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立足职责做好消费扶贫。消费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好的一项扶贫举措，也是供销社的职能职责和优势所在。要组织全系统商贸连锁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采取设立扶贫专区专柜、订单农业、直供直销等方式，与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加快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运用新技术新模式，进一步拓宽扶贫农产品销售渠道。积极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等活动，引导消费者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参与消费扶贫。

用心用情做好定点扶贫。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四个不摘”的要求，持续在产业发展、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发展思路上为贫困县做实事，真正帮在要处、扶在难处、干在实处。供销社社本级将加大对安徽潜山、江西寻乌和安远3个定点扶贫和对口支援县的帮扶，不断加大帮扶资金投入，大力帮助销售农副产品；与此同时，指导各级供销社全力做好对口贫困县、贫困村的帮扶工作，做到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措施不松。

综合施策巩固脱贫成果。指导动员全系统2万多家社有企业采取直接投资、参股经营等方式，在贫困地区建设原料生产基地，发展壮大可持续性扶贫产业。推动供销社总社所属7家科研院所加快科技成果在贫困地区转化落地；发挥全系统18万家行业协会作用，组织会员单位在贫困地区发展种养殖基地，带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用好全系统90多所各类职业院校教育培训资源，加强对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增强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

落实责任，改进作风，确保脱贫攻坚任务落地见效

当前是向脱贫攻坚发起总攻、夺取全胜的决战时刻，需要以更强的工作责任、更大的工作力度、更实的工作作风，抓紧抓实抓细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各级供销社社要坚决扛起脱贫攻坚政治责任，把疫情防控期间激发出的顽强斗志转化为投身脱贫攻坚的强大力量，主动担当作为，认真履职尽责。进一步健全扶贫工作机制，督促任务重的地区成立工作专班，抽调精干力量，进行集中攻坚，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进一步强化督促落实。聚焦扶贫目标任务，坚持定期调度、定期督导，督任务、督进度、督责任、督成效，形成抓落实的倒逼机制。加强全系统扶贫项目、资金实施情况的跟踪问效，落实项目建设和运营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强化扶贫项目资金的规范使用和监督，坚决防止供销社系统系统在扶贫过程中出现腐败问题。

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各级供销社社将严格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的新要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决杜绝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空喊口号。大力弘扬“扁担精神”“背篓精神”等供销社社优良传统，将互助合作、扶贫济困的合作社价值理念发扬光大，引导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扎实的工作作风，和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一起苦、一起干，努力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